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
与中国革命
1905 — 1948

颜海平 著
季剑青 译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 与中国革命

1905 — 1948

颜海平 著
季剑青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 1905—1948 / 颜海平著; 季剑青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6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ISBN 978-7-301-18178-2

I. ①中… II. ①颜… ②季… III. ①女作家—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2980号

书 名: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 1905—1948

著作责任者: 颜海平 著 季剑青 译

责任编辑: 丁超 姜贞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178-2/K·072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5.25印张 450千字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致 谢

当我于 2008 年春得知劳特里奇出版公司 (Routledge Publishers) 即将出版《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 1905—1948》一书的平装本的时候, 同一个月里我又收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邀请, 希望出版它的中译本。这两项决定令我欣喜, 也稍感意外。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 我一面在构思写作这本书, 同时也在发表从跨文化、跨国别的角度研讨 20 世纪文学、戏剧和相关审美批判理论的论著, 而长期以来这些研讨对象是按照传统的学科或地缘政治的类别来界定和分隔的, 比如说英国、英语南撒哈拉非洲和美国的女性文学家、戏剧家, 以及起源于大陆欧洲的批判理论思想家们。我在这些跨国别、跨学科研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认知视域, 激发和促成我探索研究和阐释中国现代女作家, 中国现当代文化与艺术, 乃至现代中国人文历史和社会发展本身的路径和方法。在当时被界定为有别于欧美主流的“区域研究”制度安排下的“中国研究”及其流行的话语语境中, 现代中国女作家的革命性文化遗产的重要内涵似乎是一个说不出的故事; 人们倾向于将中国的革命女性在根本上看作是她们亲身参与的中国革命工具化的牺牲品。在一个全球消费主义超速复制的 90 年代, 写这样一本书似乎不很合时宜, 它不仅要阐明 20 世纪中国富有创世纪一般想象力的女作家和女艺术家, 是如何将她们自己转变为自身现实历史的能动力之源, 而且还要重申她们的女性主义意识和身体力行的想象在中国革命精神遗产中的核心地位。然而, 这本书现在被太平洋两岸的人们索要, 英语平装本和中文版同时问世, 这又一次提醒我, 人类历史中某些看似“不合时宜”的努力, 也许正是时代的内在产物和挑战要求。这些年来, 我在不同场合所表达的这一基本看法, 支撑着我的学术探索;

并会在今后的岁月中, 伴随着我将这样一种智性劳动继续下去。

现在, 是到了致谢的时候了。

我要感谢珊德拉·莫汉蒂 (Chandra Mohanty)、阿玛·阿塔·艾杜 (Ama Ata Aidoo)、贝尔·胡克斯 (bell hooks) 和雅基·亚历山大 (Jacqui Alexander)。我非常有幸能在进入美国学术界最初几年的工作中成为他们的同事。和这些具有跨文化、跨国别学术道路和经历的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学者进行的持续交流, 不仅鼓励了我对中国女性的历史进行重访, 而且使我采用了某种根本上是跨国界的思路和视域来开启这番研究。同时, 我要感谢诸位从事女性主义戏剧文学和演出实践研究的同事, 他们的著作作为我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一种参考性学术资源, 滋养着我的探索, 将原本显得离散的女性活动——从文字印刷出版和舞台现场演出的领域一直到街头和战场的实际空间——汇合凝聚到一个富于历史意义的星座中。他们是马文·卡尔森 (Marvin Carlson)、艾琳·戴尔蒙德 (Elin Diamond)、吉尔·多兰 (Jill Dolan)、苏珊·福斯特 (Susan Forster)、苏珊·本内特 (Susan Bennett)、哈利·埃拉姆 (Harry Elam)、约瑟夫·罗奇 (Joseph Roach)、大卫·萨弗兰 (David Savran)、香农·杰克逊 (Shannon Jackson)、凯瑟琳·科尔 (Catherine Cole)、简·格林汉姆-琼斯 (Jean Graham-Jones)、夏洛特·坎宁 (Charlotte Canning)、特雷西·戴维斯 (Tracy Davis) 和里克·诺勒斯 (Ric Knowles) 等; 还有全美高等教育戏剧研究学会所属的“女性和戏剧协会” (the Women and Theatre Focus Group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atre in Higher Education)、国际戏剧研究学会所属的女性主义研究组 (the Feminist Group for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Theatre Research)、加州大学十校园国际表演艺术和文化研究课题组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ulti-campus Research Group in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and Culture)、密歇根大学人文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Ann Arbor)、康乃尔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 (Cornell Center for Gender Studies)、全美批评理论高级研究院 (the School of Criticism

and Theory)的所有同仁们,多年来,他们一直是我智性灵感的源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美国亚洲研究领域中有中国
社会与中国女性的论著使我获益良多。我感谢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苏珊·曼(Susan Mann)、贺萧(Gail Hershatter),柯临清(Christina Gil-
martin)、魏爱莲(Ellen Widmer)、周蕾(Rey Chow)、王玲珍、蒋红、钟雪
萍、王政、吕彤邻、艾米·杜林(Amy Dooling)、叶维利、魏丽莎(Elizabeth
Wickmman)、英国学者李如茹、日本学者小野和子(Ono Kazuko)和许多
其他学者对现代中国、中国女作家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研究与洞见。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从科罗拉多大学的胡其瑜(Evelyn Hu-
DeHart)和少数族裔姐妹学者团队(Sister-Scholars of Color Groups)以
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负责女性学者团队建设的副校长罗西娜·M. 贝
瑟拉(Rosina M. Becerra)、戏剧电影电视学院副院长埃迪·维拉里尔
(Edit Villarreal)、妇女研究系主任、联邦政府妇女问题法律顾问克里斯
蒂瓦·利特尔顿(Christina Littleton)和姐妹学者团队(Sister-Scholars
Group)那里,学习和见证了女性议题如何始终是而且也应该是内在和持
久地成为我们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多年来,我从艾莉森·贾格
(Alison Jagger)、玛格丽特·弗格森(Margaret Ferguson)、希多尼·史密
斯(Sidonie Smith)、约皮·普林斯(Yopie Prins)、格伦达·迪克森(Glenda
Dickerson)、玛格丽特·维克森(Margaret Wickerson)、弗朗索瓦兹·利
昂内特(Francoise Lionnet)、凯瑟琳·林奇(Katherine Lynch)等女性主
义学者那里获得的最为珍贵的馈赠,是对下面这一点的感同身受和深刻
信仰:女性主义学术不只是某种概念的操练或知识的炫耀,更是一种跨
越多重边界的日常实践和实践中的人生历练与人性坚守,在我们当下的
环境中,这些边界包括种族化的学科分类设置和性别化的学术等级制度,
它们总是阻碍着我们在具体的生命境遇中去实践我们的理念;而我们因
此必须坚持在日常实践中的变革。

欧柏林文理学院(Oberlin College),科罗拉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园(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密西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Ann Arbor) 的学生和友人，尤其是在美国的求学之地，现应邀任教的康乃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的卓越的师友们，是我在英语世界里，尝试叙说这“中国故事”最初因此亦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听众。

我要向女性主义研究的中国同行和女性学人致意，她们是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戴锦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路爱国，清华大学的曹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孙瑞珍，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玉、徐静华、姜进，上海文新集团的汪澜，上海妇女联合会的孙小棋，上海文化界的王安忆、黄蜀芹、彭小莲，母校复旦大学已故校长谢希德和所有杰出的前辈老师与同窗友人，清华大学前党委书记贺美英和所有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爱护扶助我的前辈和同仁，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与历史学者张济顺和所有多年诚挚合作的学友同行，还有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其他许多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朋友们，感谢她们在三十年巨变中，作为女性在智性前沿作出的卓越成就，和对我始终如一的支持。

我要特别感谢英国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 的迪莉娅·达文 (Delia Davin) 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的林春，这本书从最初的构思起，即得到了她们热情慷慨、具体明确而富于洞见的评论和建议。

由美·塞尔登 (Yumi Selden) ——她自己就是一位优美的作家——对我为完成这本书而付出的十多年的努力而言，一直是一泓生命的源泉：她的编辑协助工作一直都是无法估价的，就像这些年来我和她——以及通过她和她的孩子们——进行的交流和讨论无法估价一样。

我要对马克·塞尔登 (Mark Selden) 致以深切的感谢，作为“亚洲的转变” (Asia's Transformations) 系列丛书的总编，他那非同寻常的耐心、广博的知识和个人的热忱使得这本书付梓成为可能。和劳特里奇出版公司的出色团队合作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这个团队是由斯蒂芬妮·罗杰斯 (Stephanie Rogers) 领导的，包括索恩亚·范·里乌文 (Sonia van Leeuwen) 和所有其他同事。

华东师范大学的年轻学子，是这本书英文版在中国土地上最早的阅读者，也是其中激荡的生命蕴律热忱的呼应者。他们是：秦红雨、周佳、刘敬、杨子、潘爱娟、刘燕。

本书的中文版问世，使我从此与推介者韩毓海教授，翻译者季剑青研究员，出版者丁超，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决策人高秀芹，结为终身之友。

著作就像生命，它不仅以个体生活记忆的方式延续，还根植于群体性的生命存在和共同体的建构和延伸。因而这里同样要感谢所有偶然发现这本书或者愿意去倾听这本书中的故事的人们，这本书想要追溯、意在珍惜和期待分享的，就是这些女作家和她们非凡革命的平凡故事。

颜海平

2008 年秋

美国康乃尔大学

前 言

我重温着自己的旧笔记本，那上面有从偶然的阅读中摘录下来的段落，它们看上去就像一艘消失的船或一个消失的世界的残骸。翻阅数页，我碰到了一段多年后才读懂的文字：

保罗·克利 (Paul Klee) 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 画的是一个天使似乎正要从他无法自拔地沉思着的事物旁离去。他的眼睛入神凝视着，他张着嘴，他的翅膀两翼展开。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的天使。他的脸被扭转，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整个的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他们席卷着投掷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被打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以如此强暴的力量掌控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驱动天使，将他直推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眼前的瓦砾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瓦尔特·本雅明,《启迪》,第 257—258 页^①)

然后我看到在这段文字旁边有一个大大的问号，那是我自己划的。我停了下来。

颜海平

2006

^① 中译文见张旭东、王斑译：《启迪：本雅明文选》，三联书店，2008年，第270页。此处译者有修订。

目 录

- 005 致 谢
- 011 前 言
- 001 导 论 争取赋权 (On Empowerment)
- 023 第一章 看不见的蕴律, 巨变
- 057 第二章 秋瑾和她的想象
- 107 第三章 繁星: 冰心和 1920 年代的文学星座
- 153 第四章 别样的生活: 白薇、袁昌英和 1930 年代的社会戏剧
- 207 第五章 战争、死亡和存在的艺术: 1940 年代动荡中的女性
- 255 第六章 非真的蕴律 (一): 丁玲的女性主义之旅
- 305 第七章 非真的蕴律 (二): 丁玲故事和中国革命
- 369 后 记 当时与现在
- 373 索 引
- 387 译后记

导论

争取赋权 (On Empowerment) ①

“我柔弱，所以我强韧。”

冰心，北京，1922^②

① 作者注：“赋权”一词包涵的是与“天赋人权”的不同的出发点。中国现代人的觉醒不是与神的统治相对应，而是从本书所说的两个根本危机中生成，因此“争取权利”与其说是诉诸“天赋人权”的西方形而上学的普适主义逻辑，不如说是承载于具体(特殊)生命的社会(共通)实践。

② 冰心：《冰心全集》第1卷，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39页。[作者按：冰心诗原文是“本是顽石一般的人，……竟做了人间的弱者。”此句是冰心诗句的出处，原意出于英文《圣经》]

本书通过和一群 20 世纪中国具有开创性而影响久远的女作家——在她们文学写作和生活道路的交叉点上——的相遇，重新考察中国革命的女性主义遗产。较长时期以来，笔者注意并吸取文学研究中聚焦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构造及其性别后果的^①诸多探索和信息；但与它们的主导思路有别，笔者的主要兴趣在于中国女作家在何种激进的程度，以显然受到历史制约而又根本上是革命的方式，重塑了她们的生活及写作。笔者追踪她们的文学活动和生活轨迹，将其视为交织互构的、她们变革性的努力的场所，这是一种在历史暴力之势力场中航行，渴望和争取女性社会赋权 (women's empowerment) 的奋斗。随着讨论的深入，笔者亦将考察女性在文字和生活中所做出的这番努力，是怎样让我们能够由此重新思考 20 世纪中国和中国革命的诸多面向的。

在历史的瓦砾中

中国革命的幽灵是如何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及随后帝国主义侵略的几十年大混乱的时期中产生的，这个问题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已经讨论了很久。及至 1900 年，包括沙俄和日本在内的西方强权，已经在中国十八个行省中的十六个建立了势力范围：这一事实触目惊心。对生活在中国这一土地上的人们来说，“成为现代”的迫切要求，从危急时局中浮现出

^① 参见 Tani Barlow, "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 (Chinese Women, Chinese State, Chinese Family)",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Wendy Larsen, *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来。^①1911年辛亥革命让人们看到了这种挑战的巨大程度,但是并没有产生真正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②当国土被生地瓜分时,20世纪初的作家描绘了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创痛深巨的中国,并以失败、屈辱和可能是注定面临灭顶之灾命运的身体化意象来表现它。^③瓦尔特·本雅明对现代历史作为“一片废墟”和现代人性作为“一堆瓦砾”的描绘,在这里同样适用,其事实上的准确性一如其在社会心理上的呼唤回荡之力。

于是,在现代中国女性的写作中,以令人震惊的频率出现垂死和死亡身体的形象,就不是纯属偶然的了。它们既标示出中国社会的物质条件,亦示意着这些女性批判性想象的特殊视域。秋瑾对死于战场的女兵的召唤,庐隐对死于洪水的大批逃难人群的描绘,萧红对中国乡村饿殍遍野的农民再现,只是最显而易见的几个例子。一直被文学史家归为“闺秀女子”(feminine)而以表现超验的“母爱”(motherly love)为特色的作家冰心,把平静背后的日常困苦磨难和四处蔓延的战火中未成年儿童(特别是女孩)的死亡,带到她的写作中。众多此类作品中的虚构形象或新闻报道中的场景,伴随着这些女性对她们相知相识的真实人物的记忆,如私人的朋友、文学上的志同道合者、政治上的同志,以及生活中的伴侣。^④丁玲的《死之歌》——一部自传式的散文作品——可以被解读为对一个她及其

<1>

①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1895年甲午战争,以及1931—1945年间日本对中国长达十五年的侵略和战争,加上这之间的其他国内和国际战争,中国陷入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极度暴力之中。参见 Jean Chseneaux, Marianne Bastid, and Marie-Claire Bergere, Anne Destenay trans., *China from the Opium Wars to the 1911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6; Edward L. Dreyer, *China at War, 1901—49*, New York: Longman, 1995; Pak-Wah Leung,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2; 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6。

② 最近一本中国学者考察1920年代中国企业家的论文集显示了他们的企业是多么脆弱。参见 Tim Wright (ed.),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2。又见 Sherman Cochran (ed.), *Inventing Nanjing Road: 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 Ithaca: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r)关于瞿秋白母亲自杀的描述,表明这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沉默的痛苦能达到的致命的程度:“她小心翼翼地刮下一盒火柴头上的磷,然后和着一杯酒吞了下去。”*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1981, p.169。

④ 《妇女杂志》第7卷,1924年,第1064—1070页。

同时代女性生活于其中的混乱失序的世界的描绘。丁玲详细描绘了她关于父亲葬礼的最初记忆, 这葬礼示意了中国士大夫家族制度的解体, 之后她总结道: “在我有一点朦胧知识的时候, 我对死, 就有很深的印象。死是这样可怕的啊! 整个幼年, 我就是跟着在死的边缘上挣扎的母亲生活的。”^①

正如本书最后两章所讨论的, 丁玲“在死的边缘上”不仅度过了她的童年, 还有此后的岁月时光, 这本书中的其他女性, 在她们各自的生活道路上, 无论是事实上还是象征意义上, 都是如此。在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段, 许多女作家和艺术家英年早逝。秋瑾三十二岁时死于绍兴, 那是清廷统治的最后几年, 她的诗《致徐小淑绝命词》^②是对她自己死亡的预先的哀悼。石评梅二十六岁时在北平死于肺炎, 她所编辑的颇有影响的《蔷薇周刊》戛然而止。庐隐三十四岁时在日军战火下的上海死于过度劳累和身心俱竭。《血与火》, 她撰写的有关抗战的小说, 同时也是最后一部重要小说, 只写了一半。^③而萧红, 在战乱流离中生下一个死胎后, 只活了十八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她在日军占领下的英属香港死于误诊手术, 年仅三十一岁, 当时她还在写一部回忆她出生地的重要的中篇小说《呼兰河传》。^④如果说在 20 世纪的前三十年, 社会动乱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她们以及其他女性的生活, 那么 1937—1945 年间的抗日战争就把她们每个人都从她们原已摇摇欲坠的生活轨道上撕扯和劫持下来, 抛入战乱, 让她们全体都成为中国土地上的流亡者。“时代……已经在破坏中,” 张爱玲在沦陷的上海写道,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⑤。对几十年中这些女性如同被刀剪切断或被持续打乱打碎的生活——她们留下了这么多写了一半的故事和没有完成的著作计划——的匆匆一瞥, 会提醒我们安静下来, 凝聚精神, 去深入地重新审视和思考她们的生活 (lives)、作品 (works) 和毕生事业 (lifework) 的界定性 (defining) 条件。只有当我们把这些毕生事业

① 丁玲:《我在爱情中生长》,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8 年, 第 86—87 页。

② 秋瑾:《秋瑾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第 26—27 页。

③ 肖凤:《庐隐年表》, 见《庐隐选集》, 香港: 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 年, 第 283 页。

④ 骆宾基:《萧红小传(增订本)》,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1 年, 第 23—25 页。

⑤ 张爱玲:《张爱玲全集》第 4 卷, 台北: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1 年, 第 425 页。

置于它们的物质语境——一个死亡特别是女性死亡变得司空见惯的时空环境——之中，我们甚至才能开始——仅仅是开始——去接近探讨她们的毕生事业，其中体现的是人类为在历史的瓦砾碎片中生存下来而做出的奋斗挣扎，某种如秋瑾所说的浸润着“血与泪”的辗转跋涉。

<2>

“弱者”的性别

对这样一个领域的探索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情感上都充满挑战，因为探索者必须面对几乎是毫无遮掩的残忍和强暴。这个时代在现代中国的书写中常常有另外一种表述：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①对广阔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论领域中的女性主义学者来说，“弱”与“强”的分类是有启发性的。在欧洲史语境中写作的学者，例如琼·司各特(Joan Scott)、玛格丽特·弗格森(Margaret Ferguson)和希多尼·史密斯(Sidonie Smith)，已经以她们各自的方式指出，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一个新的、被性别化的女性的灵魂如何逐渐取代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神学的、无性别的灵魂。^②安妮·佛斯特-斯特灵(Anne Fausto-Sterling)、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和邓尼斯·莱利(Denise Riley)等其他学者则描绘了这种“神学修正”(theological revision)如何将“自治的灵魂”(autonomous soul)推到一旁，同时发展出一种女性化暨性别化的有关自然(包括生理自然)的观念来取而代之，按照这种观念，认知和思考能力的“缺位”和“匮乏”被认为是这种性别化了的“女性灵魂”的“自然”属性和特征。作为这种“缺位匮乏”的生物体现，女性于是被打上了“主体之最底层”(the bottom of a subject)的标记，构成“天然弱者”(naturally weaker)生物学意义上的证据；而以此为映衬和前提，男性主体则被建构

① 参见《辞海·语词分册》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年，第1157页。

② Joan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88/1999, Margaret Ferguson et al. (eds.), *Rewriting the Renaissance: The Discourses of Sexual Differ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Sidonie Smith, *Subjectivity, Identity, and the Bod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3.

为“强者”(stronger),被赋予了“强者”的属性。^①概括而言,“强壮的人”(the strong man)一词在欧洲语言特别是英语中,从17世纪以后才经常具有这样的含义,即这种人的身体力量或体力精力是其心智本质和道德品性的具体象征,这使得他有能力有理由有权利去占有社会、政治、财政、军事和其他机制性的权力。反之亦然。^②“弱者,你的名字叫女人,”莎士比亚通过其创造的现代王子哈姆雷特对女性作出的道德、精神和身体上的判决,是无数“名言”中的一例。^③而弗里德里希·尼采著名的(或者说声名狼藉的)关于“强者”与“弱者”内在蕴律(inherent rhythms)的图式,表现了被如此设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隐含的权力关系,这是一种“超善恶”的必然性:“当一个细胞把自己转变成一个更强壮细胞的某种机能,这是合乎道德的吗?它必须如此。当更强壮的细胞消化了较弱的细胞,这是邪恶的吗?……在想要把某些东西转化为自己的机能的强者那里,快乐和欲望相伴而生;在想要变成某种机能的弱者那里,快乐和被欲求的意愿相伴而生。”^④这种将强弱二元对立作为现代主体构造之天然条件的界定性表述,揭示出的是某种社会结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性别化的生物政治和欲

① Anne Fausto-Sterling, *Myths of Gender: Biological Theories about Women and Me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Sandra Harding and Jean F. O'Barr (eds.), *Sex and Scientific Inqui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Denise Riley, "Am I That Name?", *Feminism and the Category of 'Women' in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18; Sandra Harding, "Moderinty, Science, and Democracy", manuscript, 2006.

②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II (the compact edition), Oxford: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3716-3717; E. L. AcAdam, Jr and George Milne (eds.), *Johnson's Dictionary: A Modern Selec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3; Paul Langford (gen. ed.),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s 1, 5, 6, and 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③ 哈姆雷特指出她母亲道德、精神和身体上的弱点。在道德上她是“意志薄弱的”,因为她背叛了丈夫,嫁给了克劳迪斯,而且是在哈姆雷特国王去世仅仅两个月后就做出这番低下的举动。她在精神上是脆弱的,因为(在哈姆雷特心中,如同所有这些判决指出的)她犯下了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在身体上她是软弱的,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尽管这似乎是哈姆雷特关注最少或最隐蔽的一方面。

④ Friedrich Nietzsche, Walter Kaufmann (trans.) *The Gay Science*, New York: Vintage, 1974, pp.175-176, (德语版见 NW p.vii, p.154, GS pp.175-176, Spivak 的引文, "Introduction" to *Grammar*, p.xxvi)。

望构建的经济系统。“强者”归属于主动性的男性力量，其“本质”在于他把其他人消化为自己的机能，即为推动其作为主体的欲望扩张而服务的机能。“弱者”归属于被动的女性身体，其“天性”在于她对自身被欲求被消化而成为“强者”之机能的“意愿”。

当 20 世纪初现代欧洲的经典被大量、迅速地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这种或隐或显地生物化、自然化了的观念（笔者简称其为生物政治）及其逻辑亦被引入了中国。^① 笔者的研究关注“弱者”（the weaker）一词的表达或者意蕴，是如何具体地在现代中国女性文学中以各种比喻形式出现和再现，并如何同时成为现代中国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迟至 2000 年，北京出版的《中国女性文化》集刊的创刊号上，仍然在登载一系列处理以女性为载体的“弱者”问题的文章，对此现象笔者在结论中会重访。^②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的学者对“自我主体”和“他者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及其具体实施进行了批判性的解构，其中内在地包括了女性作为他者客体的“弱者”和男性作为主体自我的“强者”的二元对立；他们细致入微地揭示这二元对立的具体施展，是如何以法典法律、社会政策、文化规范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历史建构运作相关的诸制度之组织原则等形式进行的。^③ 对其中一部分学者而言，由所谓“生物学”之进化论规定和必然化了的“生物属性”即“命运特征”的逻辑（biology is destiny），是以“弱者之（女性化）性别”为内核的；而由此逻辑所构成的现代“身份政治”就是内在性别化的。因此，社会性别（gender）和社会有性状态（sexuality）及其特征的范畴，不仅在他们的认知政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而且成为终极关怀，譬如美国某些激进女权主义者以女性性别本身为德性

<3>

① 关于对这些翻译的学术梳理和阐释，见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台北：业强出版社，1990 年；Lydia Liu（刘禾），*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王红旗编：《中国女性文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年。这是一种以书代刊的系列出版物。

③ 当代中国社会史领域中的女学者如林春、刘伯红、杜芳琴等人的著作，直接启发了我这里的研究。